

王亚南与教育



王亚南与教育

王岱平 蒋夷牧 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



王亚南遗像

编者的话

本书是为介绍和纪念一位优秀教育家而编写的。

王亚南同志，不仅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而且是被人们广为称道和怀念的“老校长”、教育家。如同他在经济学上的贡献一样，在教育方面他不但是一个辛勤的园丁，而且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懂得人的价值，重视人材的培养，自喻为“老农”，在教育园地上数十年来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在国家急需发现和造就人材的今天，福建教育出版社把王亚南同志的教育观点和事迹介绍给广大读者和教育工作者，我们感到是很有意义的。

本书主要介绍作为教育家的王亚南同志的教育思想、理论和实践。编选的文章大都出自他生前亲友、同事、学生之手，故而感受真切。他们从不同时期、不同角度记录和反映了王亚南同志的思想感情以及他所建树的业绩。同时，我们还编入了几篇解放前后王亚南同志论述教育和科研的有关文章和章节。“以一斑窥全豹”，以期有助于大家了解王亚南同志基本的教育思想和治学经验。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教育界、学术界老前辈的热情支持，他们在百忙中为本书撰写文章。尤其是厦门大学的许多相识和不相识的同志们更是怀着对已故“老校长”的深情厚谊，在具体的编辑工作中，主动而友好地关心我们，无私地给我们提供素材，认真地帮助我们审定书稿。他们的精神使我们深受感动。在此，谨致深切的谢意。

编者

1981年1月于福州

目 录

野马和老农……………王岱平 蒋夷牧 (1)

王亚南的教育思想……………潘懋元 甘民重 陈克俭 (39)

循循善诱论治学……………周 济 (75)

王亚南同志的治学精神……………余 纲 王增炳 (81)

尊敬的校长……………卢嘉锡 (90)

难忘的师表……………潘懋元 (99)

音容宛在 事业长存……………陶大镛 (106)

感人的风范……………章振乾 (113)

春风化雨润心田……………袁镇岳 张来仪 (119)

“野马轩”的由来……………孙越生 (125)

一个懂得人的价值的人……………宋祝平 (132)

• 王亚南教育言论摘选 •

教育和社会…………… (141)

如何发挥自学的精神…………… (145)

跟青年教师谈谈怎样治学…………… (151)

和同志们谈谈几点比较原则性
的科学研究经验…………… (154)

现阶段综合性大学需要开展的
科学研究工作…………… (157)

野马和老农

——记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和教育家王亚南

王岱平 蒋夷牧

王亚南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是一位不辞劳苦，勇于攀登，学识渊博的著名经济学家，是一位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教育家。

——中共福建省委在王亚南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

楔子

如果他活着，今年正好是八十周岁。

如果他活着，他依然是一位“老农”，将一如既往在科学的大地上不倦地耕耘；

如果他活着，他依然是一位“伯乐”，将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培育更多的“千里马”；

如果他活着，他仍将衔着烟斗，在他热爱的海边散步，思索……

有一次，他十来岁的女儿问他：“爸爸，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大海？”

王亚南笑吟吟地望着女儿：“你说呢？”

“大海很美，是吗？”

“为什么美呢？”父亲反问了一句。女儿惶惑了，摇摇头。

“大海的美就因为它不息的运动。”

是的。不息的运动，不息的思索，不息地耕耘，这，不就是这位著名学者一生的写照吗？

然而，他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一年了。

一个在身后被人普遍怀念的人，总是因为他给人们留下了什么……

在求索的路上……

一九一三年深秋，在湖北黄冈县城北的一条泥泞小路上，一个身材瘦弱的孩子紧缩着身子，踩着泥浆，匆匆地跑着。连绵的秋雨早已浸湿了他单薄的衣衫。他仿佛看见在家中等着他的病体垂危而又嗜酒的父亲。他加快了脚步，双手紧紧抱着那盛满谷酒的小瓶。可是，当他一脚跨进柴门，猛地听到一片低低的呜咽。在跳动的烛火旁，他看到了两眼已经闭合的父亲形容枯槁的脸，看到了守候在一边的二姊痛苦的面容，他明白了：父亲等不到喝最后一口酒，就离开了人间。

家道中落的父辈没有给儿女留下一点东西。丧事过后，好心的大哥抚着小弟的头说：“直淮，你从小爱读书，往后，你就专心读书吧，我们家能出一个读书人也好。”二姐从钵子里拿出一块鱼干，怜爱地递到他手中，“吃吧，吃了再读书。”

他一边啃着难吃的鱼干，一边从墙缝里抽出一本泛黄的旧书，他没有忘记那位严厉的私塾老先生要他背熟的《离骚》。此刻，他一捧起书，就似乎忘记了一切，坐在墙角诵读起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在风雨如磐的中国，一个十来岁的少年往何处去“求索”？

他，感到迷惘了。但是祖国丰富的历史遗产和文学宝库却深深把他迷住了。他象海绵吸收水份一样，尽情地啃着《论语》、《左传》、《国语》、《史记》……昏黄的灶火把他瘦小的身影投射在土壁上，天凉的时候，他就这样坐在灶前读书直到深夜。夏天，他就在打谷场上，或者爬上屋顶，借着那毋需花钱去购买的月光……没有钱买书，就背，就抄。有一天，他从先生那里借来一本《东周列国志》，读了几页，爱不释手，竟然下了狠心，花了一、二个月时间，硬是把书抄了下来。贫穷，磨炼了他的意志；困难，锻炼了他的毅力。在他成为著名学者之后，他还常常向人提到，在幼年养成的背诵和抄写的习惯对于他一生的学习是何等重要。

就这样，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武昌第一中学。从此，他更如饥似渴地涉猎群书。那些有钱有势的官家子弟瞧不起这个乡下来的“土包子”，而他却更瞧不起他们的不学无术和夸夸其谈。为了少和这些人纠缠，更为了利用每一分钟的时间，他毫无顾忌地在自己的书桌上贴了一张字条：“来客只谈十分钟，过时恕不奉陪。”有人为他惋惜，这样做会少交了朋友，他却认为多读一本书远远胜过一次漫无边际的闲聊。青年人是好睡的，为了争取时间，他还仿效司马光的“警枕”，设计了一个把床板两边架空的“警床”，每当睡眠深熟之际，稍一翻身，床板就会失去平衡而歪斜。于是，他又揉一揉惺忪的两眼，点起了床头的油灯，伏案而读了。

可是，窘迫的生活屡屡给他带来困难。家里来信了，因为水灾，哥哥姐姐无法再供养他最起码的生活费用了。怎么办？是进、还是退？要读书，再苦也要把书读完！于是，为争得一份维持生命的薄酬，每天晚上，他要步行到十数里外的一个地方，去当一名英语家庭教师。春夏秋冬，风雨无

阻，只有到夜深时分，时间才是属于他的。他把这个时候视作最幸福的时刻。月光下、油灯旁，室内屋外，万籁俱寂，他可以在知识和思考的海洋里遨游了。拿他自己的话说，这时期读书是“海阔天空”。古今中外，文史哲教，无不涉及。

毕业在即，王亚南面临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了。而文学殿堂首先向他敞开了大门。祖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在他面前闪烁着迷人的光辉。写，写自己，写社会，写人生……他开始拿起笔以自己作为模特儿，写起了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的长篇小说。然而，这仅仅是一种爱好和兴趣。他一边写着小说，而现实中的满目疮痍，国家的贫困落后，又激发了他“教育救国”的热情。同时，出于实际生活的考虑，中学毕业后，他选定的却是武昌中华大学的教育系。

现在，他似乎看到一个“归宿”和目标了。以往读的那么多书，文学的、历史的、经济的、乃至数理化的，都白费了吗？没有。在大学读了一年之后，他就深深感到博览群书的优越性了。博，不仅丰富了他各个单门学科的知识面，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他的理解力。当他一旦找到自己的“归宿”之后，他感到这些五花八门的知识就象数十条涓涓细流，要汇合到一处了。而每一条细流都为那条主流增添了流量和色彩。本来看来互不相关的条条杠杠的知识变成了可以举一反三的财富。于是，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了第一条心得：“要奠定知识的基本理论的基础。”

一边是知识的积累，一边是理想的探索。《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向他展开了另一个世界的窗户。“布尔什维克”等字眼撩乱了这颗年轻的心，在跟当时任中小学教师党政训练处负责人的董必武同志的相识中，他开始对于“教育能否救国”感到怀疑了。

大革命失败了，鲜血也染红了湘江。在岳麓山上，他目睹了一场邪恶吞噬正义，卑鄙亵渎真理的丑恶的演习。面对惨酷的现实，王亚南沉思了。中国会向何处去？他又该向何处去呢？他怀着悲苦的心情，带着未完成的小说手稿茫然地流落到上海，又飘泊到杭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在大佛寺内悠长的晨钟暮鼓声中，他竟然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早春二月，西子湖畔冬装未除。一场春雪覆盖了林间小路。他寄寓在破落的大佛寺庙中已整整一星期了。这儿香火萧条，一时间竟成了一些穷学生的栖身之所。一天清早，他象往常一样，出去散步。刚出庙门，他惊讶了：是哪位早行者竟然比他更早在雪地上踩出了一条透迤细长的小路？他不禁洒开大步，循着脚印走去。在一株老梅的旁边，他看到了一个魁梧的背影。有位青年伫立梅树下，举目眺望着山上的积雪和天边的彩霞。也许是听到了声响，那人回转身来，王亚南仔细打量着他：一身学生装，朴素无华。一个平顶头，宽宽的方脸庞，一双不大但沉静的眼睛。他们彼此有礼貌地点了点头。

王亚南和郭大力就这样相识了。

从此，在古庙的厢房内，烛光融融。豪爽的王亚南和沉静的郭大力相见恨晚。

此时，刚从上海大厦大学哲学系毕业不久的郭大力，正在业余攻读经济学和马克思的《资本论》。要改变现状，要研究中国。郭大力怂恿王亚南从研究经济制度入手，王亚南动心了。他想起武昌成城中学的一位过从甚密的好友，曾借给他看的《共产党宣言》，他曾为马克思的理论和才华折服过。如今这位他乡相遇的新交又向他提起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顿时

使他象沙漠的旅人看到了绿洲一样，豁然开朗了！从研究经济着手。王亚南毅然放下了他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接受了郭大力的建议：研究政治经济学。

在共同的理想中他们找到了共同的语言。

人的一生中往往会出现一些机遇和转折，这大约就是命运吧，王亚南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衡量了主、客观条件，坚定地作了正确的自我选择。这种自我选择可以说是一个人事业上成功的最首要的因素。假如说，他与郭大力的邂逅是一种“机遇”的话，那么，就象法国科学家巴斯德说的：“机遇只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

王亚南开始以全部身心攻读经济学了。他逐渐发现他的一切知识在经济学上找到了最后的“归宿”。终于在又一个烛光摇曳的夜晚，他和郭大力立下了一个使当时不少学者望而生畏的计划：翻译《资本论》。巨大的精力来自伟大的目标。为了攀登这一个高峰，他们着手制定了长期的编译计划。王亚南的学习经验告诉他，没有雄厚的基本理论的基础，高峰是可望不可及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于是他们首先从系统地翻译几部古典经济学入手，而列入最前列的就是里嘉图的名著《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为了温饱，也为了积累知识，两位挚友不得不暂时分离。郭大力留在上海教书，王亚南则在友人的资助下东渡日本。因为当时的东京，不仅生活费用比国内低廉，而且更易得到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分手的那天，他倚在船舷旁，对他的朋友说：“我在歧途上判断出了什么是自己应走的道路，这是个胜利！”在远航的汽笛声中，他望着变得越来越小的郭大力的身影，仿佛又听到了那天在大佛寺外的雪路上他的沉静的声音：“我觉得，我们的救国之路，应该从剖析社会中去寻找。”

“这也是一种分工……”

一九四〇年深秋，重庆南郊的一条林间小路上，漫步着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人，从他那稳健的步伐，沉思的眼神以及那开始谢顶的头，看来是一位学者。是的，他就是王亚南。他正在又一次考虑着他的去向。九月的某一天，广东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亲自登门拜访了这位已经轰动一时的年青学者，聘请他到中山大学任教。

当时，中国北方大地上抗战的炮火正酣，而偏安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却依然灯红酒绿，沉迷于声色之中。本来怀着一腔热血打算投入保家卫国行列中的王亚南，心凉了。三八年初，当抗日烽火初燃之际，王亚南经友人介绍，来到了国共合作后的武昌，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设计委员会的设计委员。这委员会的领导人就是周恩来同志。在武昌期间，他不仅目睹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热血忠肠，更使他有机会在八路军办事处重遇了董必武同志。董必武同志对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建树作了热情的赞扬，董老对他说：“你们翻译这些书很必要，我们现在没有时间搞这些，你们专门来搞，这也是一种分工。”这使他感动了，并且一种庄严的使命感愈加充溢了心胸。然而不久，武汉沦陷了。设计委员会迁到重庆后，这个机构在国民党的操纵下已经名存实亡了。何去何从，王亚南陷入了深沉的思考和回忆……

自从二八年与郭大力邂逅，立志从事经济学，翻译《资本论》之后，已整整十二个年头了。回首过去，他的足迹是坚定的。在日本，不论在樱花烂漫的富士山下，或者在春光明媚的箱根郊野，几度春秋，花开花落，他却无心观赏东方古

国的湖光水色，而是让全副身心都沉浸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海洋里了。在东京的三年，他一边如饥似渴地钻研，一边踏踏实实地翻译，无论在理论和技巧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怀着“民族主义的愤慨情绪”，马上离开了日本，回到上海。当他与郭大力合译的据作者估计全英国不会有二十五人能看懂的里嘉图名著《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在上海出版的时候，这两位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竟一时轰动了上海的学术界。然而，有谁知道这仅仅是这两位年轻人一个宏大计划中的小小的一角呢？！三四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又按计划翻译出版了。然而，正当他们着手向马克思的《资本论》攀登的时候，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军入闽了。福建人民政府在著名的反蒋救国的“闽变”中宣告成立。王亚南被反蒋的情緒所鼓舞，经友人介绍，又参加了福建人民政府的工作。“闽变”失败后，被国民党通缉，立足无地，又不得不再度与郭大力分手，取道香港，到了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故乡——德国。在寓居德国的一年里，不仅使他有会接触了德国的工人群众，真切地了解了德国社会的现状、历史、风土人情，获得了丰富的感性认识，还使他进一步掌握了德语，为他今后的翻译又多了一根坚实的拐杖。当他离别欧洲，取道日本回到上海与郭大力再度重逢的时候，他们便象久经准备的登山者一样收拾起行装、工具向着那向往已久的高峰，携手登攀了。

我们不必赘述在这几度寒暑中这两位青年人曾有过多少个不眠之夜，有过多少回“拮据数根须”的斟酌苦思，只要掂一掂这三大卷书在手中的分量，他们为此付出的心血就可想而知了。值得一提的是，地下党组织了解到郭、王两人的计划后，给予了热情的支持。他们谢绝了以优厚稿酬招揽他们的神州

国光社，而与倾向进步的读书生活书店签订了合同。事后，王亚南诙谐地说：“翻译《资本论》可不是为了利润！”一九三八年秋，在滂湃的抗日烽火中，在迫切需要马列主义滋润的中国大地上，马克思主义的基石《资本论》出版了！中国人民可以从《资本论》的全译本中全面、系统地了解，学习马克思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了。

历史将会记住这两位学者的功绩。谁曾想到，就在三十年后，已经成为共产党员的王亚南，却被戴上了“翻译《资本论》是为了抵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罪名，这是一个多么不可思议的悲剧和荒唐得可惊的倒退啊？！

……武昌沦陷后，王亚南又随设计委员会来到了大后方重庆。人们悄悄传扬着两位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好事的译者，都想一睹他们的风采。谁也没有想到，当人们掀开防雨布，从披着硝烟的军用卡车上接过这第一部新书的时候，一个毫不惹人注意，戴着黑框眼镜，未满四十的青年人，正夹杂在人群之中，淌下了激情的热泪……他，就是王亚南。

……几声清脆的鸟鸣打断了王亚南的沉思，他发现已经踱到了林间小路的尽头。望着明净的蓝天，和展翅长飞的鸟儿，他的思绪又回到了今天。是的，还呆在这里干嘛？中山大学许崇清校长的邀请，又成为他事业上发展的一个“机遇”，他决定应聘前往。

太阳升起来了，王亚南浓眉一展，轻舒胸怀，尽情地欣赏着又一个新的日出……

用中国人的立场研究经济

今天星期五，是王亚南讲授《高等经济学》的日子。从

大清早起，就有许多在衡阳、韶关等地工作的学生坐火车赶到了这里，钟声未响，熙熙攘攘的人群就挤满了大教室。原来选修这门课的不过八十多人，可今天多来了二百多人。教室的大门外、窗台边都挤满了人。钟声响了，王亚南健步走来，挤在教室门口的旁听者给他让开了通道，面对二百多鸦雀无声的听课者，王亚南以刚劲的板书在黑板上写下了今天讲授的内容：领主经济和地主经济。王亚南以浓厚的湖北口音嘹亮地开讲了。他运用《资本论》的原理、方法，继续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占有形式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特点。他不断从讲台这头走到那头，挥动着双手，比划着，仿佛要把这些抽象的概念勾勒出一幅形象的示意图来。二百多双眼睛随着他的双手忽上忽下。他走到讲台的中央，抑扬顿挫地说：“从而，我认为中国的地主经济封建制不同于欧洲的领主经济封建制，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延续很久的主要原因，这就是结论。”一阵爆发的掌声打破了教室的寂静。同学们活跃起来了，情不自禁地细声议论开来。这是何等令人信服的见解，多么独到深刻的论点呵！待学生稍稍平静之后，王亚南接着说：“希望大家切不可忘记中国的现状，要用理论去解决中国的问题。”他顿了顿，又嘹亮地说：“我再再说一遍，以中国人的立场去建立中国的经济学！”他戛然止住了话。在又一阵轻轻的骚动中下课的钟声响了。学生们还是久久不愿离去，一堂课，又象一夜春雨一样，使多少山间新竹又拔节长高了。几个月来，同学们象得到了一把无形的钥匙，有了它，他们可以去打开中国经济学的大门了。学生们边走边簇拥在王亚南身边，热烈地讨论起来。而王亚南呢，他感动地望着这群可爱的青年，想得很多，很多……

他是四〇年九月接受了许崇清的聘请，到当时在靠近湖

南边境的粤北坪石的中山大学任法学院经济系主任的。那时奥地利学派(即边际效用学派,后成为英美学派)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霸占了各大学经济系的讲台。他们庸俗地认为“经济科学用不着费篇幅来讲解”,因为这是不讲自明的道理;对任何一个口渴的人来说,当然第一碗水的价值最高,而第二碗次之,第三碗更次之……如此而已。即便有所谓理论,也是完全照搬本本,甚至用英语讲授。王亚南十分瞧不起这一套东西,认为是庸俗经济学。他在高年级开起了里嘉图的《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及中国经济史、中国思想史等课程。凭他自己的造诣和经验,他觉得讲里嘉图的学说远比讲中国经济史有把握得多。但不久,他竟然发现学生对里嘉图的学说并没兴趣,效果并不好。这是为什么呢?仅仅因为里嘉图的东西深奥难懂吗?

多少个晚上,在他住的那间农舍门前的小圆桌旁,他接待了不断来访的学生,和他们促膝交谈。他发现他们首先关心的还不是经济学本身,而是中国的现状和前途。这些热血方刚、忧国忧民的青年使他感动,也使他明白了,不少人是为了寻求救国之道而来学习的啊!作为一个中国的经济学者,是否能把学习研究的这些抽象理论,拿来同现实,同中国社会的经济进行比较,发生关系呢?他思索了。渐渐,他感到中国大学讲坛上关于经济学所采取的教材和教法,大有改革的必要。他懂得了学生需要的不是成叠的讲义和原理,而是能打开现实的钥匙。于是,他把里嘉图的学说作为底本,每讲一章,例如讲价值论和地租论,就拿来说明中国的商品价值,中国的地租如何不属于里嘉图的研究范畴,或者依据里嘉图的经济范畴,从反面来论证中国社会经济的非资本主义性,使学生们看到了中国社会的症结所在。只有驱

逐外来侵略，铲除封建势力，进行土地改革，中国才有希望。于是，情况马上改变了，学生们对这样的课程和讲授法表现了极大的兴趣。这别开生面的课程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小教室容纳不下了，于是换成了大教室。而照本宣科的英美学派的课堂内，听讲者却越来越少，寥寥无几了。以后，王亚南干脆丢开了里嘉图的大著，在直接讲完一般经济形态之后就讲中国有关经济形态的相同和相异点，批判当时流行的不正确的观点。鲜明地提出：“用中国人的立场研究中国经济！”

中山大学活跃了，学术空气更自由了。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就在这样的空气里不断地教学相长。当他讲授货币、资本之后，学生们大胆地提出请求：“王先生，下次能否也讲讲中国的货币和资本呢？”这回，又是学生考老师了。于是，为了讲授需要而准备的讲稿，也成了专题的学术论文，一篇接一篇地在《中山文化季刊》，《时代中国》《广东省银行季刊》上陆续发表了。在几年之后，当王亚南回顾这一教学过程时曾颇有感触地说：“在研究过程中，不时给予我以鼓舞，并使我的研究，不得不继续努力下去的，是国立中山大学经济学系乃至全校有志于中国社会经济之科学研究的同仁和同学。他们每有机会，就提出有关方面的问题来同我商讨，这样，我便经常象是处在被考试者的地位。中国的商品与商品价值的研究，刚刚研讨出一个头绪，他们又要求我依此说明中国的货币、资本……等等。不管我的考试是否及格，而我象经常被安置在被考试者的地位却是一个事实。我在这当中，才比较理解到所谓教育者在不断被教育的意义。”

这是一个多么可贵的总结啊！

……王亚南信步走回了家。往常他总是先逗一逗儿子，